

TOP 版丑陋的中国人

望闻问切  
盘点当下道德之现状  
穷根究底  
找寻国人丑行之病理  
苦口良药  
医治社会肌体之疮疽

# 那丑陋的人

秦弓 著 花城出版社

TOP版丑陋的中国人

# 瞧那丑陋的人

秦弓 著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瞧, 那丑陋的人

秦弓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1

ISBN 7-5360-4382-1

I. 瞧...

II. 秦...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5875 号

责任编辑: 邹靖华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王越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市东印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下桥银岭街 8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625 1 插页

字 数 31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82-1/I·3512

定 价 21.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引 言

2004年6月的一天夜晚，我在北京站候车室，趁着还未剪票，又翻开了旅行时常带的《庄子》。正沉浸在《逍遥游》的神妙境界时，忽然，一阵喧嚣的声浪袭来，不只是我，身边的旅客也都吃了一惊。定睛望去，原来是一群结伴而来的民工模样的旅客。他们旁若无人地喧哗着，丝毫没有觉出自己给别人带来什么妨碍。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开始剪票了。这支几百人的队伍向前拥去，挤得先前排队的旅客一片怨言。剪票员发现他们中间有的儿童应该买票而没有车票，便把他们叫到一边补票，于是惹来了激烈的争辩。列车出站以后，我走了几节车厢，看到车上有不少空座位，行李架上也大有余地。那些旅客何至于如此拥挤呢？想一想公共汽车一到站，人们蜂拥而上的阵势，仿佛不是为了上车，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武了得。平时挤惯了，嚷惯了，已经习惯成自然，不分场合都不由自主地要挤、要嚷。如此这般的，未必都是乡下人，未必都是来自贫困地区的人。

记得有一次，享誉世界的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演出开始前十几分钟，人民大会堂南门存包处挤作一团，一些观众看不过去，喊道：“别挤了，请注意自己的德行！”按说，能进人民大会堂欣赏费城堪称一流水平演出的观众，总该有些水准，可是就在这“有些水准”的人群

瞧，那丑陋的人

中，偏偏有人德行欠佳。除了不守秩序、胡冲乱挤之外，还有姗姗来迟者在演出过程中在过道里毫无顾忌地穿行。

若是仅仅为此细枝末节就做出痛心疾首状，未免有小题大作之嫌。问题在于我们的德行现状并非仅此些微瑕疵，而是到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程度了。

先来看社会公德。

居民楼里占用公共楼道的现象司空见惯，楼上居民从窗子往下扔垃圾、泼脏水的大有人在，抛下的重物砸伤行人因而承担刑事责任的也不乏其例。列车旅客随意往车外抛垃圾，铁路两侧树上挂着无以数计的塑料袋，像是清不尽的耻辱符号。下面的人向行进中的列车扔石头，造成人身伤害连肇事者都很难找到。

上车、购门票等场合，该排队的不排队，身强力壮者横冲直撞，老幼望洋兴叹。公共汽车上的老幼专座常常大模大样地坐着年轻人，见到老幼孕妇上车，视若不见。

行人放着斑马线、过街天桥、地下通道不走，翻越隔离栏杆，甚至连高速公路都敢横穿，仅仅因此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每年都有数千起。

路边、校园、厂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草坪，明明插有“勿踏草坪”的标牌，但总是有人肆无忌惮地横穿、坐卧，甚至当成游戏场、足球场。

电话亭里的 IT 电话被塞进杂物甚至剪断、摔坏的事情时有发生。图书馆的报纸书刊被窃损的现象屡禁不绝。高等学府里新换的桌子，不久就能在桌面上看见刀刻笔画的图画，雪白的墙壁上踏上了大脚印，卫生间有人便后不冲水，剩饭剩菜堵住盥洗池，诸如此类与“天之骄子”形象反差甚大的现象每每可见。

人民的好书记张鸣岐为抗洪抢险英勇献身，可是第二天就有人将凌河大堤上的沙袋偷走，多叫烈士的英魂寒心！南方某市遭受水灾，干群一心、军民协力抗洪救灾，然而也有人每一个爬上他家楼顶平台的人收费，还有人趁机高价卖食品，昧着良心发洪灾之财。有难不救的事情时有所闻，有的受伤者或落水者因此而失去了抢救的机会。还有人为了一己私利或小集体利益，毁林毁地，盲目垦田、开矿、办厂，破坏了森林、牧场、耕地、矿产、水利、环境等宝贵资源，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接下来看职业道德。

尽管党与政府一再强调廉政建设，但是，干部队伍中官德不修、政风不正的情况仍不可忽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铺张挥霍、滥用职权成为一些官员的职业病，至于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渎职犯罪等，更是远远越过了道德底线，触犯了刑律。其严重程度，仅从新闻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就足以让人怵目惊心。

孔子有教无类的观念理应成为一条基本的教育原则，教师承担着塑造民族未来的重任，理当为人师表，但有些学校为了片面提高本校升学率，把所谓“差生”想方设法推出校门，有的教师对学习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讽刺挖苦，对“不听话”的学生“罚站”、逐出教室、甚至拳脚相加。有的学校收起钱来狮子大开口，而教学管理则松松垮垮，教育质量难以保障。据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教育竟然进入了社会腐败的“排行榜”。

医务工作关乎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因而对医务工作者有“白衣天使”之誉。但是，医务人员中，有的收取红包，视红包的大小决定治疗时间的长短、手术的先后；有

## 瞧，那丑陋的人

的小病开大方，只为多赚钱；有的极不负责任，该在右脚做的手术却做到了左脚上，应该切除有病的阑尾，竟然摘除了完好的卵巢，手术中把纱布甚至手术器械落在腹腔里或脖颈里，给患者造成意外的伤害与无尽的痛苦；有的因错用药物或延误了治疗时机，使患者的生命过早地逝去。人们害怕生病，不仅因为疾病折磨人，甚至危及生命；也因为医疗收费不透明，不知道会花多少冤枉钱；还因为一旦要住院，不知道红包应该送给谁，红包多少额度，红包怎样送法。家有病人，已经让人心力交瘁，再为送红包费神，不啻于雪上加霜。

法治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而有的执法者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的管理者乱摊派乱收费，以罚代法；有的地方、部门，权力高于法律，地方、部门利益大于国家利益，大搞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与造假者暗中通气，干扰正常执法。

有的农技人员竟然参与贩卖假良种、假化肥、假农药，坑农害农。

有的大众媒介滥用舆论工具，搞有偿新闻，以稿件或版面谋私，以新闻代广告，或以赞助为名，收取宣传费等；有的为金钱所利诱，报道失实，有的名义上维护社会正义，实际上与正义背道而驰，严重损害了新闻事业的声誉。

有的商家不讲诚信，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谋取暴利，有的坑了同胞尚嫌不够，还走出国门去坑外国人，有损国格。

演艺界有人打着慈善义演的招牌，索取巨额酬金，到了演出的时间，让观众在台下苦等，演员或其经纪人在后台寸步不让，以打马回营要挟主办方，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学术界有人操持学术公器，为个别利益阶层谋利，从中分取一杯羹；有人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为个人谋取名利；有人学风浮躁，热中于制造学术泡沫与学术垃圾。

再来看家庭道德。

有的家庭不是平等相待，而是人格歧视，恃强凌弱，实行精神虐待甚至家庭暴力。

有的人对孩子娇惯过度，使之养成好吃懒做、攀比享受、不求上进的不良个性，以致成为害群之马。有的人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出气筒，对孩子态度粗暴，动辄打骂。有的人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在假期安排、高考志愿、恋爱婚姻等问题上，家长意志决定一切。有的人望子成龙，考试成绩未达到家长设定的标准，就责骂、体罚、殴打，重者致残致死。

有人对老人不尽赡养义务，百般寻找借口，逃避责任，遗弃老人；有的勉强出钱，但对老人不体贴，不沟通、不慰藉，甚至出言不逊，进行精神虐待。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诚然。我们社会的德行主流是好的、积极向上的。有孔繁森、张鸣岐、郑培民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有吴天祥、王廷江、李国安为代表的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好干部，有徐虎、李素丽这样兢兢业业干工作的劳动模范，更有千千万万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好人；许多家庭洋溢着尊老爱幼、夫妻平等、全家和睦的良好风气；关键时刻，有徐洪刚这样的英雄挺身而出，日常生活中，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但是，主流的清澄并不能掩饰支流的浑浊及逆流的恶臭，如果不及时加强道德建设，不良风气将会恶性传染，泛滥成灾，有损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形象与



瞧，那丑陋的人

身心健康，殃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把道德建设作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并明确了目标、要求和办法，这无疑是十分英明的。

道德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变化。譬如：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个性意识、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环境意识等，或者从无到有，或者从弱到强。但道德规范与道德行为的变化又不是完全被动的，并非打开了国门，开放了市场，走向了富裕，道德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道德建设需要积极引导与切实加强，这样才能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使改革者与建设者有一个明朗向上的道德品行与精神氛围，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张家港的成功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反之，道德滑坡则会制约经济发展、妨碍社会安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阴影。

譬如，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罗家坡村，80年代靠开采、加工、销售绿松石致富。到80年代末，全村370户，50%以上成为万元户，10万元以上的有10多户，不少农户盖起了小楼，请了保姆、厨师。然而精神文明建设一度放任自流，出现了精神贫困、道德滑坡现象。村小学惟二的两间教室成了危房无人问津，超计划生育面达到99%，刑事案件频频发生，甚至发生了亲兄弟为争利而动刀，结果一死一伤的痛心之事。惨痛的教训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上级派工作组进村，启动了以“十星级农户”管理为核心的精神文明重建工程，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村里出现了安定祥和、文明向上的新风尚。罗家坡村的前后变化充分说明道德乃至整

个精神文明建设万万忽视不得。

中国素有重视德行的传统。《周礼·地官·师氏》有：“敏德以为行本。”郑玄注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诗经》就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象喻着对道德高尚、光明正大者的敬仰、仿效。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留下了大量关于修身养德的思想材料，耳熟能详的就有许多，譬如：“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又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平生德义人间诵，身后何劳更立碑”；“闻义贵能徙，见贤思与齐”；“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等等。古人描绘出色彩斑斓的道德理想画卷，不遗余力地推行教化，勉励道德修养，褒奖道德行为，留下了丰富博大的道德传统，矗立了光照千秋的道德丰碑，忧国沉江的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铁面无私的包公，清正廉明的于谦，胸襟豁达的蔺相如，等等，至今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古代道德传统无疑为今天的现代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的偏颇性以及传统道德的历史局限性。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社会，重德治而轻法治，这一传统至今仍有影响。譬如一提到官员腐败问题，有人就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世界观的改造，道德自制力差，丢掉了忠、仁、清、公、慎、勤的官德传统。

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忽略，但法治方面的原因也决不能等闲视之。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没有行之有效的

监督，只靠个人的道德良心，是不保险的。中国古往今来有鞠躬尽瘁、清正廉明的官德传统，继承这一传统，加强自律，对于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必须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即古人所谓“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让官员在知道该怎样做的同时，也明了不应该怎样做，一旦违法将受到怎样的惩罚。

有了明确的道德要求与健全的法律，还必须有力、有效的监督。上级的监督检查是必要的，更有效的则是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后两种监督还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与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在监督官员上面，还未能尽显其英雄本色。

道德泛化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弊端。万事均用道德去衡量，用道德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用善恶的分辨来取代真伪、有无、是非的判定。政治道德是官员的首要道德，在封建社会，皇帝只要认为一个官吏对他忠贞不二，那么，那个官吏是否阿谀成性、谎话连篇，是否贪污受贿、欺侮百姓，都可以另当别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道德可以消解法律的严肃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官相护，狼狈为奸，都可以从庞杂暧昧的传统道德中找到依据。

现代观念认为，道德不是万能的，不能指望用道德去解决本该由体制、法律、经济、科学、教育等去解决的问题。譬如，不能只凭“天地良心”处理财产问题，不能简单地把“恋物癖”、“易装癖”（男女易装）及同性恋不分青红皂白地斥之为道德败坏，等等。我们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也要消除道德泛化传统的消极影响，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事物，科学地、切实地解决问题。

与道德泛化密切相关的是道德标准的绝对化，把道德要

求推向极端，让人可望而不可及，谨修一世而不能合其圭臬。把私欲视为洪水猛兽，这就助长了虚伪之风。所谓虚伪，一是务虚不务实，做欺上瞒下的表面文章，靠花架子撑台，只要看上去符合道德要求、赢得有德名声就心满意足，就可以站稳脚跟，至于实际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利之大小则无须顾及；二是作伪，为骗取虚名而弄虚作假。

庄子借温伯雪子之口批评国人“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在一定意义上切中了要害。秦汉以前，哲人尚且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后世哲人也没有将理欲绝对对立起来，而是指出二者的同一性，譬如清代王夫之就说：“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吕坤也说：“七情总是个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关于个人之欲和他人之欲的关系，戴震说：“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

可惜这种明智通达之论在两千余年历史中，并不是伦理大厦的顶梁柱，充当顶梁柱的却是一味强调压抑个人欲求的伦理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经流行的“大公无私”、“狠斗私心一闪念”，实际上是把“存天理灭人欲”推向了极端，除了扼杀个性价值、养成普遍的虚伪做作之外别无他用。道德规范的设定应符合人自身具有生理欲求、社会欲求与精神欲求的实际，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任何超前、超高的道德规范不仅是对人的不合理禁锢，而且也是对道德本身的戕害。

道德有一部分具有人类普遍性、历史永恒性，譬如尊老爱幼、爱惜生命等等，也有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阶段性。以历史阶段性来说，传统社会认可的道德

## 瞧，那丑陋的人

观念，有些在今天已经明显落伍了，譬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见利争让，闻义争为”等等。

道固当忧，贫亦怎可不忧？尽管至今仍然还能听到安贫乐道的劝慰，但颇有一些硕士生、博士生边读书边打工了，毕业以后放弃了导师希望他们接班的清苦学术，走向更加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岗位。这种选择，无可厚非。否则，饥肠辘辘，何谈学术？“闻义争为”诚然可嘉，但“见利争让”就成了问题。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见利争让会导致何种结局可想而知。落伍的道德观念终将被历史所淘汰，被新的道德观念所取代，但由于人类道德水平的不均衡性，以及道德本身的固着性，一种旧的道德观念不会轻易地、一刀切地退出历史舞台。因而，我们在承领优良传统恩泽的同时，也势必要承受陈腐道德带来的麻烦与痛苦。

这样看来，当前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原因就复杂起来：有西方消极文化的影响，也有体制转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迁带来的困惑，还有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再就是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传统道德弊端。传统道德慰藉我们民族的心灵，规范我们民族的言行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精华也罢，糟粕也罢，都已通过遗传与熏陶进入了我们每一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体现于我们的言行，成为我们文化性格、精神生命的有机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弘扬优良传统深得民心，而扬弃糟粕却分外艰难。

首先要辨析出哪些是糟粕就不大容易，然后要批判、摒弃糟粕就更其不易，因为人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不愿受剜肉割疮之苦。这一点颇像女性抛弃裹脚布的艰难历程。缠了千余年的脚，习惯了以丑为美，忽然听说三寸金莲是病态，女

性自身与一些出于习惯或别的动机而喜欢小脚的男人，一下子很难接受，结果光是这宣传动员，说明天足胜过小脚就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缠脚时痛苦，放脚时也痛苦，有人只放了几天，就受不了没有裹脚布走路的疼痛，又缠了起来，就那么一直蹒跚到老。

道德观念的转变比放脚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譬如男尊女卑，即使从明代末年李贽算起，对它的否定也有了400余年，20世纪的批判更是规模空前、火力空前，但至今它还相当顽固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相当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女大学生找工作处于劣势，工人下岗女工首当其冲，溺杀女婴现象仍未绝迹，有的倒是不用顶着溺婴的罪名，而是利用现代超声波技术早早查出胎儿性别，从速流产。不只有些男性看不起女性，而且女性中竟也存在着严重的性别自卑。由此可见，传统道德的因袭力量该有多大。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仁人志士，意识到重建精神文明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开始反省包括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五四时期掀起了新文化启蒙运动高潮，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全面澄清。然而，道德体系的解构与重建谈何容易！较早反思传统道德弊端的严复不久就打了退堂鼓，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因时势剧变而落潮。当年曾有保守派攻击新文化前驱者是过激主义、数典忘祖；大半个世纪之后，又有人开始清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讨伐新文化阵营的“民族虚无主义”了。近年来，有海外华人学者提出国民性批判是受了西方殖民主义影响的观点，国内很快便有积极响应者，指责文化启蒙前驱者上了殖民主义的当。

## 瞧，那丑陋的人

前驱者当然不是碰不得的偶像，五四的功过后人有权予以评说。但是，正确地评价历史，一是要进行历史还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具体的历史现象，二是要有现代眼光，用现代意识的光芒去穿透历史的迷茫，认识历史的真相。如果认真地这样尝试一下，也许不会得出简单而失之武断的结论来。

国民性批判确实与殖民主义者有关，因为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中国人才从闯进来的外国人身上看到迥异于我们的民族性；又通过出国留学、考察的亲身经历，看到异种民族性格是与怎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相关；另外，西方传教士所写的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与思考（包括批判）的著作，也给中国人的民族体认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意识到国民性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从对比中看到了自己以前未曾觉察的瑕疵，于是，才有国民性批判话题的提出与深入。如今国民性中一些可喜的新质，应该说渊源于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批判。当然，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怎么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上当”呢？

国民性批判是一个五四时期未了的话题。儒家向来倡导自省、责己，主张深责己而薄责人。这是对个人而言。一旦这个“己”扩及群体乃至全民族或民族文化，自省就变为自爱，责己就化为强烈的自尊与自我保护。所以民族自我批评殊为艰难，连鲁迅那一代新文化先驱者都难免受责之虞。然而，正如先贤所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

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说我们的民族是个大君子想必不能算不敬，既然要弘扬传统文化，责己改过的传统当在弘扬之列。那么，继承并发扬鲁迅精神，以责己改过的态度对传统道德予以反省、澄清，当属儒家题中应有之义，亦是现代道德建设之必需。

传统道德不只是“斯人已乘黄鹤去”的历史形态，也不仅呈现为文献形态，而且活在今人的心理世界与言语行为上面。既然如此，就不妨多从后者切入，这样或许可以多一点现实感。但历史批判本已不易，现实批评更加艰难。然而，为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形象更趋完美，为了我们祖国的现代化大厦更为壮观，请允许我不揣冒昧来品评中国人的德行。柏杨曾有书名为《丑陋的中国人》，本书借其意而化用，姑且就叫：《瞧，那丑陋的人》。



# 目 录

---

引言 / 1

---

## 公德篇

爱国心 / 3

公德意识 / 11

法律意识 / 17

红绿灯为谁而亮 / 25

农民兄弟，请听我说 / 30

毛道 / 36

“痰迷” / 38

诚信问题 / 42

见义勇为 / 46

---

## 社会篇

酷 / 53

关系 / 57

道德法庭 / 64

“司马迁算老儿？” / 69

“联合国的官儿有多大？” / 72

日光 / 77

“君子动口不动手” / 81

另一种“推拿” / 85

---